
理性革命

—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与湖北模式和江苏模式的比较

沈航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鸦片战争后, 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辛亥革命时期, 革命党人将这些理念融入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浙江革命党人秉承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革命活动, 由此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除了浙江模式, 还形成了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但从革命成果来看, 浙江的辛亥革命既彻底推翻了清政府, 又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因此, 浙江模式优于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

【关键词】 理性主义; 人道主义; 革命; 浙江; 湖北; 江苏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292 (2014) 03 — 0137 — 04

一、前言

鸦片战争后, 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国门洞开后, 中国的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 并乐于接纳西方文明中能为我所用的元素。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核心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论, 因其提倡的观点符合精英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 因此, 被资产阶级革命者接受并推崇。理性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启蒙哲学出现的。启蒙哲学的核心内容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意识、反对愚昧落后的一种哲学思想。其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在中世纪, 君权与神权统治着欧洲大陆, 上帝与国王的权威至高无上, 不许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存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 任何颂扬人性以及人性解放的思想都会被认为是异端思想, 人被牢牢地束缚在神权与君权之下。启蒙运动兴起后, 人性开始得到解放, 反对封建意识、反对愚昧落后的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理性主义提倡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等方面以人的理智进行判断, 取代了先前以上帝评判一切的原则。而理性这个概念不仅出现在一些著作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 理性这个词已经被多数欧洲人挂在嘴边, 他们开始用理性的观点审视自己身边的一切事物。理性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 凭借这种能力, 基本的真理被直观地把握^①, 其特点是人能运用理智判断是非, 并以此为基础维护人类的最大利益。与理性主义思想同时产生的还有人道主义思想。在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与教会思想束缚的过程中, 西方的精英提出了人道主义的主张。与理性主义一样, 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意识、反对宗教的愚昧思想, 提倡关怀人、尊重人, 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念。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以温情的态度对待一切, 甚至是与其敌对的人。这与基督教提倡的“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主张有些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 西方的精英们将人道主义具体阐述为后来我们所熟知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法国大革命前期, 资产阶级对王室与贵族过于温情, 导致了国王与贵族的叛乱。此后, 法国资产阶级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仅处死了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 还在国内制造了长期的革命恐怖, 一时间法国各地断头台林立, 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法国大革命从温情到暴力的实践显然有悖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主张。

收稿日期: 2014 - 04 - 14

基金项目: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重点课题成果 (125419)

作者简介: 沈航,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民国浙江史。

二、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

中国的精英们在引进理性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浙江的革命模式既有资产阶级理性的因素，又闪烁着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光辉，可以称为理性革命。

浙江革命党人根据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浙江革命斗争的特点制定了一条以军事震慑为手段、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光复方针。军事震慑体现的是浙江革命党人的一种军事威慑力，主要从精神上摧垮敌人的战斗意志，以不杀伤敌人生命为目的，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早在浙江革命之前，浙江革命党人就打算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在浙江的满人。1911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就是秉承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光复活动的。当夜，革命党人进入杭州城几乎没有受到较大的抵抗。革命党人与清军有武装接触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处，分别为城门、巡抚署、军械局与旗营。当革命军行至凤山门时，“有管门之某营弁，亦系旗人，硬不肯开，亦被杀毙”^②。除此满人之外，城门附近并未有满人被杀。在巡抚署，虽然革命党人与清军有激烈的交火，但仅仅死满人一人。旗营之战是革命党人运用军事震慑较为成功的范例。革命党人以优势兵力围困旗营后，随即派遣使者入营劝降。无果后，革命党人采取向旗营中施放“不开花炮”，震慑满人。满人鉴于革命党人人道，于是派遣佐领贵林出营谈判。在革命党人理性、人道地对待满人的基础上，满人最终放下武器，杭州旗营和平光复。据吕公望称，旗营之战“被我军击死二人”^③。此外“陆军讲武学堂学生余耀祥，于是夜刺死反抗之旗人学生一名”^④。由上可知，整个杭州光复之役，满人仅死五人。这对于一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而言，效率是高的，而代价是小的。杭州光复后，浙江革命党人掌握政权，但满族少壮派人士策划暗杀、投毒事件，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一时间杭州城内的民众人心惶惶。革命党人理性应对，采取“不株连、不滥杀”的措施，只将为首之人处决以为警示，对于查无实据的满人则予以宽大。浙江革命党人采取的理性措施使满人逐渐认识到，革命党人的革命并不是要“驱满”，于是满汉矛盾得到化解。

三、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

全国并不是每个省都能像浙江一样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革命运动的。如在发动辛亥首役之地的武汉，面对清政府的血腥屠杀政策，湖北革命党人根本不可能以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方针进行革命运动，他们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进行革命，由此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在江苏，由于旧立宪派势力的强大，旧立宪派人采取“不流血”的方式，由此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江苏模式。

1. 所谓湖北模式，就是枪炮革命，即完全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革命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湖北革命党人还是被清政府派来镇压革命的北洋军，对待敌对方绝无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可言。1911年10月初，湖广总督瑞澂接到清政府密电称革命党人将于武汉起事，于是加大防范力度，瑞澂下令收缴新军士兵的子弹与机枪炮栓，并宣布新军各营提前一日过中秋节，宣布中秋节当天全城戒严，严禁士兵外出，有形迹可疑者一律格杀勿论。10月9日，发生了宝善里爆炸事件，瑞澂于是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三人不幸被捕。10日凌晨，三位烈士即被瑞澂杀害。先烈的牺牲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0月10日晚，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到11日夜，除了张彪所部所占的刘家庙一带尚未被革命军克复，武汉三镇宣告光复。

武汉三镇的光复其实只是湖北革命党人与清政府进行军事对抗的开端。清政府闻讯后随即调动水陆大军对武汉进攻。清政府下诏令“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匪。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飭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飭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⑤，并令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由陆军大臣荫昌节制调遣。10月14日，清政府再次下诏，对调往武昌的军队进行调配，由荫昌为第一军军统，统辖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旅、混成第十一协；由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统辖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为巩固北京的防务，特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由载涛统辖。清军的南下由此揭开了长达四十余日阳厦之战的序幕。阳厦之战由汉口战役与汉阳战役组成，革命军与清军双方都投入了较多的兵力，双方人员的死伤与破坏是武昌三镇光复时的数十倍。

10月16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决定肃清盘踞在刘家庙一带的清军。18日凌晨3时，革命军一千三百余人分兵三路向清军发动攻击，双方互有攻防。经过革命军的轮番进攻，清军开始纷纷撤退，但此后，清军凭借火车站对革命军进行射击，革命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没有将刘家庙车站攻陷。19日，革命军增加兵力到2700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战至下午3时，革命军完全占领了刘家庙车站。张彪等人逃往汉口。此后，双方围绕着三道桥展开了几场小规模战斗，互有输赢。不久，清军大部南下，前锋已到达汉口。双方围绕着汉口进行了汉口战役。10月24日，混成第三协、第七协、第十一混成协赶到汉口前线，由萨镇冰指挥的海军舰队也已到达武昌长江江面。26日，清军展开大举围攻，清舰向革命军阵地猛烈开火，使革命军牺牲达五百多人^⑧。革命军被迫后撤至大智门，刘家庙失守。下午1时，革命军由第二协与第四协进行反攻，革命军异常英勇，与清军进行肉搏战，终将刘家庙夺回。

但刘家庙在清军的强烈炮火下再次陷落，“是役也，毙革命军八百余名，虏二百余，获山炮三十六尊，枪械子弹无算”^⑨。刘家庙失守后，革命军被迫退守汉口城区。革命军以街道楼房为掩护，与清军展开巷战。10月30日，第一军军统冯国璋来到汉口，见战况焦灼不下，便下令焚烧汉口城区以驱逐革命军。清军对于汉口民众异常残暴，“铺户所存洋油，北洋军悉数取出，沿路用以纵火，全镇火头无数，有出而扑救者，北洋军辄以手枪恫吓之”^⑩。汉口全城随即陷入火海，“数十处火光照耀如昼，至天明未熄”^⑪。上海《大陆日报》记者、英国人丁格尔当时正在汉口，他亲眼目睹了汉口的大火与汉口民众遭受的痛苦。“火苗疯狂地蔓延到右边，到左边，又重新汇到中心地带，这些我都尽收眼底。烈焰残酷地撕破这块宽广而不规则的火焰带，不久又会把它汇合起来。那令人恐惧的火焰好像分成了数段，每一段好像与另一段在进行杀戮和焚烧竞赛，使许多无法逃生的温顺的人们慢慢死去”。“这座庞大的城市被野蛮地摧毁，变成了一座死城和一个使人流泪的地方”。在讲到清军的暴行时，丁格尔甚至将清军的暴行与将放火焚烧罗马城的残暴皇帝——尼禄相提并论^⑫。11月1日夜，汉口被清军完全占领。此战后汉口三分之二的城区仅剩下一堆被烧焦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妇女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屠杀齐头并进。汉口俨然成为人间地狱。11月27日，汉阳被北洋军攻陷后，战线就基本稳定。此后，湖北军政府与北洋军达成停战协议，湖北战事告一段落。湖北模式，是典型的暴力革命模式，以枪炮的暴力行为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样也开启了民主共和新时代的大门。然而在光复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双方的军事对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既没有丝毫的温情，也缺乏理性的元素，尤其是冯国璋火焚汉口城，对武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使战后武汉的重建困难重重。除了湖北，上海、南京等地也主要是通过枪炮革命的方式完成光复的。

2. 江苏模式与湖北模式不同，其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方式是通过非暴力、不流血的“和”的手段进行的。因当时的省城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⑬，因此，江苏模式也可称为“瓦片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狂潮迅速波及东南各省。11月初，江苏士绅已经多次开会，决定推举代表向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愿独立。11月4日，上海光复后，上海革命党人派遣民军五十余人，由沪专车赴苏。他们先到枫桥新军标营向新军官兵传达上海光复的消息，得到新军官兵的响应。5日天明时，新军马队、步兵、工程、辎重等队官兵均在臂上系上白布，先后进入苏州城，把住各处要道，将苏州城控制起来。民军进城后，直接前往江苏巡抚衙门，请程德全宣布光复。程德全当即宣布：“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无可如何”正表现了此时程德全的心境，程德全选择了与革命党人“和”的态度，答应就任中华民国江苏军政府都督。于是民军将江苏都督印呈上，连放九炮，并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高悬旗杆之上^⑭。可以说苏州的光复不费一兵一矢。时人有诗歌描述了当时光复的情景：“昔闻站伐千家哭，今见共和万众欢。编户白旗无定式，空闻红女尽来观。功深保障新开府，谊重贤劳故长官。却有望乡来归客，秋风羁旅在长安。”^⑮当时苏州的学堂学生在听闻苏州和平光复后都拍手唱歌，学堂都停课三天以示庆祝。苏州城光复后，其下辖的昆山、吴江等地均以苏州光复为模式和平宣告光复。苏州的光复促成了江苏全省的光复，数日之内，除南京外，江苏各府均宣告光复。但这种“瓦片革命”的光复模式并未使江苏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相反的是，“全省除少数州县政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外，多数均完全或基本上由地主绅商、旧官僚把持政权”^⑯。当时的江苏军政府由程德全任都督，张一麐为民政司长（由沈恩孚代理），由蒋懋熙任警察总监、应德闳任财政司长、江绍烈为司法司长，以上官员均是前清的司道连任。为了装点门面，表示江苏已经实现了民主共和，因此“大家认为有一个同盟会会员在座较好”^⑰，所以就邀请了同盟会会员张志鹤入都督府，在

民政司属下任职。所以江苏军政府的实权牢牢地掌握在以程德全为代表的旧官僚绅商手中。

1912年年初，革命党人（同盟会）为夺取由程德全把持的军政大权，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又派蒯祖同在苏州组织中华共和促进会进行活动。程德全表面上对他们非常敬重，委任蒯际唐为筹饷局主任与柳伯英一起主持工作，其实大权都操纵在其心腹卢鹿苹手中。筹饷局成为新旧势力斗争的场所。随着矛盾的加剧，革命党人开始策划武力驱逐程德全的活动。江防营调走后，革命党人认为程德全的兵力减少，是驱逐他的大好时机。于是，柳伯英等人便在虎丘冷香阁秘密开会，组织了“洗程会”。当时决定军事由柳伯英负责，并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其美未到前由柳伯英代理。上海同盟会机关部也秘密运送弹药，以为支援。为筹划起义，他们连日在蒯家开会商议，但事被卢鹿苹得知。卢鹿苹当即向程德全报告。于是，程德全派兵包围蒯家，蒯氏兄弟不幸被捕。蒯氏兄弟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督练公所。柳伯英因伏在蒯家房顶上三天三夜未被发现，因此幸免于难。程德全为洗脱杀害革命党人的罪责，伪称蒯氏兄弟等人组织了“洗城会”，谎称他们要洗劫苏州城，因此将他们正法^①。经过程德全的屠杀，江苏革命党势力大多被清除，虽然此时的江苏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但从本质上来说，江苏的政权仍旧是由旧官僚与绅商控制，社会状况与前清无异。

江苏的“瓦片革命”模式虽然是一次不流血的光复运动，对于快速推翻清王朝在江苏的统治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其对江苏社会长远的发展来说，仍存在较大的弊端。尤其在社会稳定方面其弊端日显。由于没有经过政权的重组与旧军队的裁编，江苏省内各种新旧矛盾持续升级，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苏州城内“抢劫之风日甚，争斗之祸日烈，其甚者至于开枪对敌”。1911年12月29日晚上10点后，原驻扎在臬台衙门的陆师选锋营兵士十余人，在城内巡逻，到旧藩台衙门时，有标兵出来查问，不知何故，双方发生争执，于是双方互相开枪射击。选锋营有二人受伤，于是一边派人飞奔回营求援，一边将炮位拖出置于藩台衙门前。西路商团民团闻讯后即来弹压。后经调解，双方队官辨明误会，这才结束了双方的冲突。在光复后的江苏，像这样新旧军队的冲突不胜枚举，时人有评：“凡前所纪，不过其甚者，至于小风潮几于无日无之。”^②江苏的“瓦片革命”模式虽然充满了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元素，但始终缺乏打破旧制度、重建新制度的理性因素，因此，才会在社会上引起各种风潮。

四、结语

将辛亥浙江模式、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进行比较可知，江苏革命虽然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但清政府在江苏的汉族官员基本上都改头换面成为光复元勋，换汤不换药的是，江苏的政权仍旧由旧官僚旧士绅把持，革命党人处于无权的弱势，甚至面临被屠杀的命运。蒯氏兄弟遇害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在使用暴力手段的程度方面，浙江理性革命模式显然要比枪炮革命模式和缓得多。浙江的革命者更倾向于使用有限的军事震慑手段，而不是无节制的攻伐。这就与湖北革命党人进行的军事暴力不同，湖北革命党人迫于形势不得不以单纯的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与江苏的革命相比较，浙江的革命进行了军事震慑，运用有限的军事手段推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对于民主共和的新浙江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是：浙江革命党人不仅较为彻底地铲除了清政府在浙江的政权组织，建立起由革命党人掌控的浙江军政府。在建设民主共和的新浙江的过程中，浙江革命党人仍旧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原则既处理包括满汉民族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还较好地解决了浙江省内的财政危机与推进移风易俗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民国初年，浙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浙江的理想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② 浙江光复记[N]．申报，1911—11—08.

-
- ③ 吕公望 .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C]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④ 顾乃斌 . 浙江革命记 [C] //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浙江省图书馆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⑤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 [C] // 辛亥革命:第 5 册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⑥ 章开沅, 林增平 . 辛亥革命史:下册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 ⑦ 佚名 . 辛亥九月北军残毁汉口见闻录 [C] //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编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 ⑧ 汉口战报 [N] . 申报, 1912 - 11 - 04.
- ⑨ [英] 埃德温·J·丁格尔 . 中国的革命 1911 - 1912 [M] . 张建军, 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⑩ 钱伟卿 . 谈程德全二三事 [C] //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 ⑪ 郭孝成 . 中国革命纪事本末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 ⑫ 胡蕴 . 秋风诗 [C] // 昆山文史:第 10 辑 . 昆山:昆山市委员会文史征集委员会, 1991.
- ⑬ 黄炎培 .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C] //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 .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 ⑭ 胡觉民 . 关于“洗城会”事件 [C] //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M]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